

社会学视野下近代秘密社会生存模式变迁

陆 勇

(盐城工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秘密社会的生存模式可以从其组织结构形式、资源获取方式、社会交往模式和内部聚合机制等“显性”要素来进行系统考察;在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这些“显性”要素随之发生了变化:组织结构由传统的“封闭型”逐渐向“开放型”嬗变;社会资源获取方式由“非正式”途径向“非正式”与“正式途径”交替转变;社会交往模式“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内部聚合由“价值导向”机制向“利益激励”机制嬗变。

关键词:秘密社会;教门;帮会;社会变迁;生存模式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9)04-0081-08

近代中国是秘密社会膨胀时期,各种教门与帮会组织遍及中国的城乡基层社会,它们依附于主流社会而生存、繁衍,与社会变迁交互,成为近代中国“亚”社会系统的“暗流”,“传统意义上近代中国的三大高潮(太平天国、义和团和辛亥革命)竟是与秘密结社密不可分的”。^[1]与传统的秘密社会相比,近代秘密社会从组织结构形式、资源获取方式、社会交往模式和内部聚合机制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嬗变,生存模式的适应性调整是其膨胀的重要原因。从社会学的视角考察近代秘密社会生存模式,旨在剖析秘密社会与社会转型之间的互动关系,并进而为当代社会综合治理秘密社会问题提供借鉴。

现代社会学认为,在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里,都有社会成员共同奉行的价值观念与行为方式,称为“主文化”或“主流文化”,同样也存在不占统治地位的局部的文化现象,称之为“亚文化”或“次文化”。所谓“亚文化”也即“某个社会群体中存在的不同于社会主流文化的一套价值观念和行模式”,“亚文化”与“主文化”之间存在从属或者对立的关系,而对立关系则可能逐步形成“犯罪

亚文化”。^[2]按照这种文化归属,可以把社会群体分成两大系统,即“主流”社会系统与“亚”社会系统,秘密社会从文化归属上看,与“主文化”存在着既从属又对立的关系,因而可以视作“亚”社会系统的“暗流”。

从历史上看,中国秘密社会包括两大系统:一种是带有宗教性的结社组织,利用师徒传承的方式结成,学术界称之为“异端教派”“秘密教门”或“民间宗教”“秘密宗教”;另一种是利用结拜异姓弟兄的方式结成,学术界称为帮会或秘密会党。^[3]秘密社会分属不同的社会群体,群体成员因为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模式形成对群体的归属感与认同感,同时又以特定的价值观念与行模式,区别于其他社会群体,特别是主流社会群体,形成独特的生存模式。传统中国社会的秘密社会大致呈“南会北教”的布局,即:南方多会党,北方多教门,诚如陶成章所谓的“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会盛于南而不盛于北”。^[4]当然这种布局也不是绝对的,“教”与“会”在清代中叶就出现交融,例如,乾隆年间,李凌魁的大乘教分支一直与天地会保持关系,到嘉庆六年加入天地会,“另造阴盘、阳盘名目,暗藏天地二字”。^[5]在晚清社会变迁中,“伴随宗教色彩的淡漠和教门组织的裂

收稿日期:2019-08-15

基金项目:教育部 2018 年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18YJAZH061)

作者简介:陆勇(1966—),男,江苏苏州人,研究员,博士,研究方向:中国近代社会史。

变,秘密教门与会门关系日趋紧密,出现会、教的融合,既是教又是会,会教难辩”,^[6]教门与会门在相互合作过程中,教门内部类似会门的“武场”组织不断强化,“南会北教”的布局逐渐被会教融合趋势所改变,会门与教门的区别由于生存模式的趋同,而很难截然分开。在近代秘密社会的构成中,正是由于社会变迁引发的会教融合,除了传统的帮会与教门外,出现了近代会道门和青帮,他们与传统的秘密社会相比在生存模式上存在很大的差异。

生存模式是指社会个体或者群体为达到生存目的在主动适应自然、社会生存环境过程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生存方式。社会群体是人类社会的主体,个人仅是“类”存在物,在社会的形成过程中,“正是在个人作为类存在物并进行人类化的过程中,个人才能与他人建立起社会关系,成为社会群体的成员,成为社会存在物”,^[7]因而脱离社会群体考察个体的生存模式是毫无意义的。同样,秘密社会的生存模式属“亚”社会系统中社会群体的生存方式,由于与“主流社会”系统社会群体以及“亚”社会系统其他社会群体共同处于相同的社会空间之中,其生存模式又不能局限于从秘密社会自身去考察。

从秘密社会的形成来看,处于弱势群体的社会阶层由于社会地位悬殊,致使其生存与发展空间过于狭小,“这个社会弱势阶层中的那些禀赋超群、具有突出的和特别与众不同的性格特征的人就可能得不到进一步塑造,或者顶多只能退求另一种方向的发展,这种发展若由当时存在的社会结构来审视,必然会被认为是‘反社会性的’”,^[8]以他们为中心积聚的社会群体成为“亚”社会系统中的“暗流”,秘密社会的生存模式所体现出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与“主流社会”群体存在“异曲同工”“殊途同归”的关联。“主流文化”变迁影响“亚文化”变迁,并进而会波及秘密社会的生存环境,近代秘密社会生存模式的变化同样也是社会变迁的结果。

秘密社会的生存模式可以从其组织结构形式、资源获取方式、社会交往模式和内部聚合机制等显性要素来进行系统考察。近代社会变迁过程中,这些显性要素的变化,体现出作为亚社会系统“暗流”的秘密社会,其生存模式的适应性调整对维系组织生存的意义。

二

秘密社会作为基层社会组织,它与“主流社会”群体一样,同样也有其特定的组织目标和组织机构。社会学认为,“社会组织结构是指组织为了实现一定目标而使各组成部分相互协调起来的一种模式”,社会组织结构包含着分化和整合两个方面的内容,“分化指的是将组织工作分解为各个任务,整合指将这些任务协调起来”。^[9]秘密社会的组织机构从大的类型来看,既包括基于教规、帮规等各种规章、制度所构建的正式结构,也包括基于道德、伦理、情感等价值取向所形成的非正式结构。社会变迁所引发的“主流”文化的变化对“亚文化”所尊崇的制度文化与价值取向产生深刻影响,并进而促使秘密社会组织结构产生相应的调整,以实现其组织目标最大化。

传统中国秘密社会的组织结构形式是脱胎于“主流社会”基层组织结构形式,从而体现出秘密社会的组织目标与“主流”社会的一致性。传统社会基层的组织机构是基于农耕社会生存模式形成的,通常并不是简单理解为村落。施坚雅从分析市场结构对村落结构的影响后,建立起“市场共同体理论”,认为传统中国基层社会单位是基层集市,“农民的实际社会区域的边界不是由他所住村庄的狭窄的范围决定,而是由他的基层市场区域的边界决定”;^[10]而弗里德曼在分析乡村村落的宗族结构后,提出了“宗族共同体理论”,认为宗族“几乎在中国的每一个地方,几个紧密相连的村落构成乡村社会的基本单位,‘宗族’通常只是村落的一个部分”,但是在考察广东和福建两省以后,他发现“宗族和村落明显重叠在一起,以至于许多村落只有单个宗族”。^[11]从这个意义上讲,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结构可以体现出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乡村社会成员的社会区域突破村落本身的范围,二是宗族关系成为维系组织结构稳定的纽带。这种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特点同样体现在传统中国的秘密社会中。

传统中国秘密社会,无论是秘密教门,还是帮会组织,组织结构是“类市场”型的,即以特定的区域为中心构建起组织单位,然后逐步蔓延,在其他地域形成新的中心和相对独立的组织单位,并进而构建秘密社会的整个组织体系。例如,明正德年间由罗清创立的无为教(罗教)起初在北直隶密云卫一带,后逐渐风靡大江南北,在传播过程

中,罗教分成若干以特定区域为中心的支派,在组织结构上相对独立,“一是罗氏家族依照血统世代相传;二是外姓弟子衣钵授受,祖祖相承;三是通过大运河运粮军工,由北向南传播,是为‘青帮’的前身;四是在浙、闽、赣等省形成江南的斋教”。^[12]清初在福建、粤东及台湾一带流传天地会,后逐渐发展至广东全省及江西、广西、贵州、云南及湖南等省,天地会系统组织结构的各分支机构相对独立,名目各异,“各地山堂林立,互不统属,各行其是,无直接联系”。^[13]这种“类市场”型的组织结构体系,参照了传统中国基层社会组织的“集市”模式,适应在政府高压下,秘密社会自身的延续与发展。

传统秘密社会在内部的结构上,参照了传统基层社会的“宗族”控制模式,建立了纵向的或横向的虚拟血缘关系和“类祖先崇拜”。传统社会基层的宗族结构是通过家族的父子、兄弟血亲关系来维系的,在秘密社会系统,这种血亲关系通过虚拟血缘关系来构建。

秘密教门通常是以纵向的虚拟父子关系来组织,体现为师徒关系,所谓“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帮会则是以横向的虚拟兄弟关系来组织,体现为师兄弟关系,所谓“桃园结义,生死兄弟”。虚拟血缘关系旨在仿照传统基层社会组织结构,构建秘密社会内部的权威,这种权威来自传统基层社会的价值取向,俗语“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是这种价值取向的表征。但是,秘密社会单位组织结构的虚拟血缘关系毕竟不同于“主流社会”基层组织真实血亲关系,由此,产生了维持虚拟血缘关系的秘密社会的制度、规章,这些制度、规章类似于宗族关系中的族规、家规,并构成了秘密社会组织结构的“正式结构”,秘密社会的教义、帮规不仅体现出对传统价值观的尊重,而且还通过“类祖先崇拜”,巩固了虚拟血缘关系所形成的内部权威。例如,秘密教门通过师徒传承,以无生老母为偶像崇拜,同时也尊历代“前人”为祖师;帮会则通过兄弟结义,以“关公”为偶像崇拜,按照入会先后排序兄弟位次,建立相应组织结构。秘密社会的这种组织结构形式切合了中国基层社会传统,保持了秘密社会实现组织目标,维系了内部的稳定。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具有“外源性”特点,“所谓外源性是相对于内源性而言的,意思是说这种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不是(或不全

是)‘由社会自身力量产生的内部创新’,而是在西方的外来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下发生的从传统到近代的转变”,近代中国的社会和文化在变迁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内源性的社会变迁和文化转型所碰到和必须解决的‘古今’问题外,还有‘东西’问题”。^[14]“主流文化”的“古今东西”碰撞所引发的价值取向的多维性同样对“亚文化”系统产生相应的影响,作为“亚文化”系统“暗流”的秘密社会,其组织结构较之传统而言,体现开放型特点。例如,脱胎于罗教水手行帮、形成于近代的青帮组织,虽然仍以传统的虚拟血缘关系维持组织权威,但是在实际演变过程中,出现纵向与横向虚拟血缘关系的“乱伦”,帮规所严禁的所谓“爬香头”现象在近代社会变迁中司空见惯,典型的如上海黄金荣青帮系统。而且,由虚拟血缘关系所产生的家长权威更多被“实力”所取代,传统的帮规所构建的“正式结构”逐渐仿照近代社会组织结构发生演变,如,近代上海青帮的各种所谓“社团”,就是组织结构适应“主流社会”变迁的一种适应性调整。

近代社会变迁带来的基层社会的组织结构的变化,也促使依附基层社会存在的秘密社会结构出现嬗变,传统的乡绅、宗族控制的乡村社会由于社会动荡面临深刻的变化,“近代社会处于既定权威迅速流失的急剧变革和高度混乱状态中,乡村基层社会日渐失去国家控制,趋于无序”,“乡村地方的土豪、劣绅、地痞、流氓等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和暴力恶行横行乡里,欺压日趋分散孤立的一般乡民,自动成为乡村地方实际统治者”,^[15]大量的弱势社会成员寻求秘密社会的保护,这也使得传统秘密社会组织结构呈现出开放型的特点,整合教与会组织结构,使教、会融合的趋势增强。例如,教门系统加强“武场”组织,暴力化倾向增强,形成近代会道门组织;帮会组织不再拘泥于传统隐秘特征,例如,青帮组织吸收了盐枭的组织结构,同时兼采传统天地会结构模式。^[16]组织结构的开放型在社会动荡中维持了秘密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在民国帮会系统中,青帮与洪帮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反映出结构适应性调整对秘密社会生存的意义。

由此可见,秘密社会的组织体系是仿“主流”基层社会组织结构而构建的,组织结构的变化与“主流”社会变迁相契合,以适应秘密社会的生存与发展;近代社会变迁所引发“亚社会”系统的价

值取向的变化和基层社会组织结构的变迁,使得作为“暗流”的秘密社会,其组织结构也由传统的“封闭型”逐渐向“开放型”嬗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教”“会”组织模型的交融,而且也体现在仿近代“主流社会”组织的“古今东西”掺杂。

三

社会组织,包括秘密社会,都必须占有一定的社会资源,才能维持其存在与发展。从社会组织的角度而言,社会公共组织“大致说来,会有政治的、法律的、行政的和社会的四条资源获取途径,这些途径之间的主要区别在于获取方式的特征方面,而不在于与特定资源的对应性”。传统秘密社会成员来自于基层社会的弱势群体,“主流社会”获取资源的四种主要途径缺失使这部分社会成员转而寻求“非正式途径”获取各种社会资源,“正式途径与非正式途径的区别在于是否根据法律、规章和制度所规定的程序来获取资源”,^[17]但是由于在获取资源的对象方面,秘密社会与“主流社会”系统并无明显区别,因而只要社会生存环境允许,秘密社会同样也会采用“主流社会”的正式途径去获取社会资源。

中国传统秘密社会由于传统社会的政治、经济生态环境的逼迫,获取资源方式主要是通过“非正式途径”。在传统社会中,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成员在社会资源分配上处于劣势且生活质量低下,在正常社会组织体系中,面临饥荒、战乱等所引发的社会动荡,个体的抗风险能力低,传统政治的“歧视”加剧他们的危机感,加入秘密社会,形成群体力量,似乎成为底层小民最后的依靠。以清代为例,“清代基层社会组织主要有里社保甲坊厢系列、家族宗族乡族系列、行业组织经济型乡族组织系列三大系列”,^[18]但对处于组织体系最低层群体而言,在社会秩序稳定状态下,勉强获取维系生存必需的资源,一旦出现动荡,这些基层组织缺乏足够的资源来保证所有成员的生存,最低层社会成员唯有脱离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另觅生计。而在传统社会,脱离原有的基层组织体系,更多的是离开本乡本土,这就出现了“脱籍”现象,在以户籍构建社会秩序的传统社会中,这是违法行为。尽管法律规定,任何人不能随意“脱籍”,看似不分社会成员的身份,但是,事实上“脱籍”的也只有处于最底层的社会群体,这也就是布莱克“歧视理论”所说的“歧视”,即“法律不

可能消灭这些不平等和歧视,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做到法律上的平等,只是把社会上的不平等固定下来”。^[19]“正式途径”很难获取社会资源的社会群体,只有凭借“山高皇帝远”的地理空间环境,晓散夜聚,藏纳亡命,组织各种秘密社会团体。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秘密社会既是下层平民谋求生路和声音的反映,又带有与政府统治秩序对抗的政治色彩,同时也带着类似黑社会组织的种种弊端”。^[20]

近代社会变迁所带来的社会政治、法律、行政和社会方面的变化,拓宽了社会群体的资源获取渠道,同样也使秘密社会的资源获取方式发生了变化,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资源获取方式交替使用,成为近代秘密社会区别于传统秘密社会的重要特点,这个特点伴随着近代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越发明显。例如,早期的青帮组织主要在长江下游一带与盐枭势力相勾结,从事打家劫舍、贩毒走私等非法行当,以获取生存资源;清末民初,青帮除了部分继续在沿运河一带操持旧业,甚至沦为土匪外,大部分开始进入沿江城市,形成所谓的“城市帮会”,“尽管长江沿江各城市进入近代的时间、城市的规模、城市的行政布局、城市的生活形态各不相同”,“但受近代中国社会演化的整体走势的影响,长江沿岸城市帮会的演进仍然呈现出大体一致的阶段性”。^[21]城市型的青帮除了从事走私毒品、贩卖妇女(所谓“摘桑叶”)、“占码头”“开码头”“收陋规”“包做人”,“抱台脚”等非法营生外,还主要从事各种特殊行业,如茶馆、酒店、戏院、浴室、旅馆、脚行等合法经营,甚至在上海的一些青帮“闻人”转而经营渔市、航运、银行等正规的工商业,逐渐使传统的非法经济由“灰色”向“白色”过渡。此外,在政治上面,秘密社会还通过“政治参与”拓展了获取社会资源的渠道,仅在民初的上海,跻身于警界的青帮“大”字“通”辈人物就有不少,如:来自盐城的陈永康、阜宁的金九林、安徽的柏寿山、上海本地的强德胜等。^[22]近代的会道门组织,如一贯道,除了沿用传统的手段猎取生存资源,在获取模式上采用了一些公开的形式,如公开的培训班、模仿合法宗教的公开的各种道场、法事等等,以获得组织生存的资源。

社会资源获取方式由“非正式”途径向“非正式”与“正式途径”的交替,体现出近代秘密社会充分利用“主流社会”所提供的可能条件,谋取可资利用的组织资源,拓展组织的生存空间的能力,

清末、民初,秘密社会的膨胀,很大程度上与资源猎取方式的变化有关。但是,由于秘密社会本身“亚社会性”,公共资源的开放对于秘密社会而言还是有限的,游离于体制外的各种社会势力,特别是秘密社会组织,都受到日趋稳定的社会秩序对其生存空间的挤压,民初政府对帮会势力打击和教门势力的取缔表明,秘密社会获取资源的“正式途径”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非正式途径仍然是许多秘密社会组织主要的资源获取方式,即便在特定时期依附于一定政治、军事集团的秘密社会群体,其被利用的价值和本身的存在方式,仍然主要凭借其传统“非正式途径”。

四

交往是人类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式,“交往既是社会性的、实践性的,也是物质性的、历史性的”,^[23]在“主流社会”中,人与人、人与社会群体以及社会群体之间通过交往与互动,满足各自的利益诉求,依附于“主流”社会系统的“亚”社会群体,同样也要通过在与“主流”社会系统的交往与互动中,保持群体的活力,维持组织的生存。秘密社会的社会交往范围包括组织内部成员之间的交往、秘密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和秘密社会与“主流社会”系统的交往,通过交往形式,秘密社会与各种不同社会群体产生交流、联系与互动,使秘密社会组织得以存在和发展,从这意义而言,秘密社会的社会交往是其生存的基础,因而,社会交往模式成为秘密社会生存模式的重要内容。

近代秘密社会交往模式的变迁体现在交往的目的、交往的形式、交往的内容、交往的层次和交往的手段等多个层面,总体特征是由“单一化”交往模式向“多样化”交往模式转变。

在传统农业社会,社会交往以家族为中心,兼顾邻里的日常交往为主,交往模式单一,交往对象一般局限于血缘、地缘和业缘关系范围内,在政治、经济和精神领域内的非正式交往对于大多数人群而言,相去甚远,因而,“在农业文明漫长的历史时期内,日常交往在全部的人类交往活动中依旧占据着主导性地位,非日常的社会交往活动领域相对不发达”。^[24]基于虚拟血缘关系的秘密社会,其成员交往模式与“主流社会”相仿。以横向虚拟血缘的帮会为例,“兄弟结义”类似于主流社会家族体系中的“义亲”关系,人们既可以通过

结义进行生活上互助,也可以通过结义,形成社会组织,实现一定目标,而后者一旦具备了明确的目标、严格的纪律、共同的信仰,并形成一定的等级秩序,就有可能成为秘密社会。因而,帮会的“兄弟结义”其实“不过是利用社会普遍存在的家族关系形式,用以维系组织内部团结,实现组织的纲领和目标”。^[25]其社会交往模式同样受制于家族交往关系的制约,体现单一化和狭隘性的特点。因而,秘密社会的内部交往通常建立在成员共同“家族”认同的基础上,目的是利用虚拟血缘关系达到成员间的生活互助、精神慰藉,成员的个体交往通常局限在帮会或者教门的内部,交往的模式体现为“晓聚夜散”或者“聚众斗殴”,大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内部成员的交往还通常借助于“暗语”“手势”“茶碗阵”“飘布”等手段相互识别;秘密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相对较少,秘密教门各有自己的教主、教义,帮会间也很少来往,地盘相对固定,因而所谓的“南会北教”在表述秘密社会的分布上虽然不一定准确,但却能反映出秘密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关系。当然也不能排除特定时期,秘密社会组织之间的大联合,例如,乾隆中后期的五省天理教起事,但是,日常的秘密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大体如此;秘密社会组织与主流社会的交往,一般仅限于获取直接的生存的必需的资源,并无间接的政治上的目的。

近代社会变迁引发了主流社会交往模式的嬗变,并由此使得依附于大社会的秘密社会的生存环境发生了变化,秘密社会的交往模式相应进行了调整。近代社会交往模式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近代交通业的发展,使人们的交往圈逐渐突破原有家族、地域的限制;二是近代经济变迁,使得人们的交往内容也逐渐突破传统的以基本存在资料获取为目的交往活动,政治因素在人们日常交往内容中比重逐渐增大;三是社会风气的逐渐开化,人们在社会交往模式中,传统的等级观念逐渐打破,不同阶层人们的交往增强。兼有罗教特点和帮会色彩的青帮出现、青帮与红帮在上世纪初的相互融合、近代会道门的出现等等都表明秘密社会组织之间的交往日趋密切,特别是民国初年,帮会与教门的社团化,秘密社会组织的交往模式出现适应性的调整,传统的茶碗阵、手势在成员之间的交往中并不是特别重要,等级森严的内部关系在成员的交往中逐渐松动。以民国上海青帮为例,一方面组织内部的类似“空子”

“爬香头”“藐视前人”的现象司空见惯,另一方面,社会交往关系逐渐渗透到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交往对象可以是个人、组织甚至是国家机构,单纯为了简单的生活资源的交往形式仅仅局限在基层。

近代秘密社会交往由单一性向多样化过渡,这种过渡是秘密社会的适应性调整过程,它意味着,秘密社会在融入“主流社会”过程中,自身也在发生蜕变,但是,秘密社会与“主流社会”毕竟是不相容的,近代社会变迁中,不通过适当的手段加以抑制,整个社会都会出现“江湖化”的风险。

五

秘密社会组织的聚合机制是秘密社会聚合集体意志、整合组织力量并最终实现秘密组织目标的功能,它是各种物质、精神手段与方式交互作用所形成一种综合功能,体现为秘密社会组织体系运行基本规律。作为“亚社会”系统的“暗流”,秘密社会的聚合机制同样依照“主流社会”模型来建构,“主流社会”的价值取向与利益激励的聚合机制同样影响秘密社会。秘密社会的聚合机制同样包括价值引导与物质刺激两个层面,传统秘密社会以前者为主。

在传统社会,生存的基本资料匮乏,生存环境的险恶,使得秘密社会组织更多地从精神层面来凝聚成员的意志,即通过相互认同的价值取向来维系组织。这与传统的“主流社会”相似,只不过由于其“秘密地下”的特性而显得更加神秘。这种神秘性体现在秘密社会的偶像崇拜、秘密仪式和等级体系等各个方面。

偶像崇拜是传统社会人们精神信仰的最大特点,人们将自己信奉的神灵塑造成各种形象加以膜拜,以期获得心灵上的慰藉。在传统中国的“主流社会”中,人们最日常的偶像崇拜是所谓的“祖先崇拜”,就是将“对于祖先、先王圣贤的崇拜和敬仰予以神灵化,并将他们塑成偶像,予以供奉”。^[26]秘密社会偶像崇拜的“先人”形象来自“主流社会”,可以是历史上的英雄人物,如关公,也可以是创立帮会或教门的祖先,如罗教的罗清,等等。不同的“偶像”决定了秘密社会组织不同的价值取向,成为其控制或者凝聚成员的精神力量,同时也使组织树立了自身的绝对权威。

“焚香化纸、叩拜祭祷”是传统社会重要民俗,也是“主流社会”传承其价值取向的重要媒

介,各种类型的开坛仪式在传统民间社会司空见惯。秘密社会组织同样也利用“开坛仪式”来聚合成员,例如,秘密教门通常定期进行秘密仪式,宣传教义、传授心法、招收门徒;帮会借助于“开山立堂”仪式,扩大影响、聚合帮众、处置帮内重大事宜。由于秘密社会的隐秘性,这些秘密仪式通常不为外人所知,例如,哥老会的开山堂仪式,“开山式,必设于深山古庙中,人迹不到之所,择黄道吉日行之”,^[27]新人加入哥老会必须开“香堂”,“香堂”分两种,一称“大香堂”,礼节较繁;一称“小香堂”,礼节较简。^[28]

秘密社会还习染了传统社会的等级观念,以严格的等级制度规范内部的上下秩序,其中秘密教门的等级尤为森严。例如,形成于康熙初年的八卦教,一直由刘姓家族充当教首,势力发展庞大,直到乾隆年间“清水教案”发生,政府才初窥其貌。八卦教按照“内安九宫,外立八卦”的组织体系,少数世代传教的家族为教内特权阶层,教内尊卑有序,以震卦为例,“上奉刘省过为教主、王中为卦长。卦长之下设六爻,掌爻封号是指路真人,指路真人下面是开路真人、挡来真人、总流水、流水、点火、全仕、传仕、麦仕、秋仕等教职”,^[29]教职分工明确、责守分明、等级森严。帮会以兄弟相称,等级虽然不如教门森严,但其内部的权势与利益分配也是借助于不同的等级。以天地会为例,内部有按照“传统家族制纵向发展”的模式建立的虚拟的“五房制”,“头领一般分为总理(即元帅)、香主、白扇、先锋、红棍几个等级,即按大哥、二哥、三哥次序排列”,^[30]普通成员一般称之为“草鞋”,帮会内部偶有“穿草鞋上山”“一步登天”的越级现象,但是很少。

近代社会的变迁带来人们观念上的变迁和社会生态环境的变化,使这种以“价值引导”为主的组织聚合模式发生了嬗变,秘密社会的聚合机制进行了适应性的调整,无论是传统的秘密社会组织,还是新形成的会道门、近代帮会,“利益激励”逐渐成为其组织成员聚合的主要机制。带有强烈迷信色彩的偶像崇拜逐渐淡出,神秘的组织仪式逐渐公开化,森严的等级体系也在强大的物质利益面前逐渐瓦解。

尽管由于秘密社会本身的“秘密”性,秘密组织的聚合仍然充满了“神秘”性,但相对于传统社会而言,已经有天壤之别,到清末民初,至少秘密社会成员,不再讳言其身份,能够以公开或者半公

开的身份参与日常的社会活动。

以近代青帮为例,可以清晰地看出秘密社会聚合机制的变迁。脱胎于早期罗教水手行帮的青帮组织,融合了传统帮会和盐枭的组织体系,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生长,特别是在形成城市型帮会组织以后,势力发展迅速,并成为民国最大的秘密社会组织,其内部的聚合机制主要是“利益激励”。

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上海市3%以上人口为秘密社会组织成员,其中绝大部分为青帮成员,到1949年,上海有48名青帮著名头目,“所有这些头目都开门收徒,根据自己的利益自行其是,哪怕是血肉相搏”,^[31]他们聚合成员的方式是“物质利益”:青帮内部以“利益”相互聚集;不同的青帮组织之间以“利益”相互合作。大量外来人口在涌入这座近代化城市以后,出于维护或者获取“利益”而加入青帮组织,青帮在适应近代社会变迁中表现出独特的生存能力。偶像崇拜尽管作为帮会的传统予以保留,但是其作凝聚人心的功能大大削弱,“藐视前人”“爬香倒箎”甚至“父子同师”表明传统的青帮“十大帮规”只是徒具其文;“灵前孝祖”“空子”收徒等现象体现出现实“利益”与“实力”成为近代帮会生存的法则。为了聚合组织成员,青帮的仪式也去繁就简,传统的大香堂很少再开,聚合成员通常只开临时或正式的小香堂,而且香堂也可以让“空子”参观,收徒的形式可以是“门生”,也可以是“弟子”。青帮上层日常聚合可以通过恒社、仁社、忠信社等各种正式社团组织;下层通过青帮组织控制的码头、行会和同乡会来聚合。

考察秘密社会的聚合机制,可以发现,适应近代社会变迁的秘密组织,在聚合机制上更加“务实”,例如,青帮就是把握住了近代上海城市的特

殊性,拓展了其生存领域。相对而言,类似“洪门”这类传统的秘密社会组织,固守传统的“价值取向”模式,其聚合成员的方式依旧是传统的“义气”“宗旨”,奉行所谓“由青转红,挂彩披红。由红转青,扒皮抽筋”的戒律,结果其生存空间在近代社会转型中日趋狭小。

六

考察近代社会变迁中的秘密社会变迁可以得出以下基本结论:近代中国秘密社会的膨胀与秘密社会组织生存模式的适应性调整密切相关。在近代社会变迁中,秘密社会的组织结构由“封闭性”向“开放型”转变;资源获取方式由“非正式获取”为主转向“正式途径”与“非正式”途径获取并存;社会交往模式也由“单一化”趋向于“多样化”;内部聚合机制从价值聚合机制向利益聚合机制转变。

当今社会仍处于社会的转型期,各种秘密社会组织生存的土壤仍然存在,在“主流社会”之外存在“亚社会”组织,这一现状短期是不可能根绝的。在当下中国,有组织犯罪仍然是政府打击的重点,在社会转型期,带有黑社会性质的秘密社会组织逐年增多,这类犯罪团伙遍及城乡,他们多“以侵财为目标,以暴力为基本手段”,其基本发展趋势是:“组织化程度发展越来越高”;“向智能化、现代化发展”;“团伙人数越来越多,成员越来越复杂”;“反社会心理不断强化”;活动呈“跨区域、国际化”趋势,等等。^[32]要控制带有黑社会性质团伙犯罪,必须弄清其生存模式,通过各种措施挤压其生存空间,这样才能最大程度上抑制其繁衍。

参考文献:

- [1] 时刚,华强. 近代社会转型期的流民问题与秘密结社[J]. 南京政治学院学报,2010(1):67-71.
- [2] 吴鹏森. 犯罪社会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260-261.
- [3] 秦宝琦. 对历史上民间秘密结社与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关系的思考[A]. 巴忠倓. 战略机遇期的把握和利用:第四届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C].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6:269.
- [4] 陶成章. 教会源流考[A]. 萧一山. 近代秘密社会史料[Z]. 长沙:岳麓书社,1986:207.
- [5] 江西巡抚秦承恩奏折[A]. 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八年十二月初八.
- [6] 陆勇. 晚清秘密教门与近代社会变迁[J]. 云南社会科学,2003(4):83-87.
- [7] 武天林. 实践生成论人学[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103.
- [8] [德]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个体的社会[M]. 翟三江,陆兴华,译.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62.
- [9] 王丽英. 社会学基础[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8:113.

- [10] [美]施坚雅. 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M]. 史建云,徐秀丽,译.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40.
- [11] [英]莫里斯·弗里德曼. 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M]. 刘晓春,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37.
- [12] 马西沙,韩秉方. 中国民间宗教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223.
- [13] 郑天挺. 清史(上编)[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9:455.
- [14] 郑大华,胡峰. 近代中国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的特点[N]. 光明日报,2010-12-14(12).
- [15] 徐勇. 非均衡的中国政治:城市与乡村比较[M].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293.
- [16] 陆勇. 晚清社会变迁中的长江下游青帮[J]. 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103-109.
- [17] 张康之. 任务型组织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66.
- [18] 张研. 清代社会的慢变量[M].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378.
- [19] 朱景文. 比较法社会学的框架和方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487.
- [20] 贾西津. 历史上的民间组织与中国“社会”分析[J].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05(3):41-46.
- [21] 张仲礼,熊月之,沈祖炜. 长江沿江城市与中国近代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53.
- [22] 郭绪印. 清帮秘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544.
- [23] 王锐生. 社会哲学导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144.
- [24] 王晓东. 日常交往与非日常交往[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149.
- [25] 王玉波. 大樊笼·小樊笼:中国传统生活方式[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1989:227.
- [26] 王夫子. 殡葬文化学:死亡文化的全方位解读[M].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224.
- [27] [日]平山周. 中国秘密社会史[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84.
- [28] 秦宝琦,孟超. 秘密结社与清代社会[M]. 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215.
- [29] 马西沙,韩秉方. 中国民间宗教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955.
- [30] 蔡少卿. 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6.
- [31] [澳]布赖恩·马丁. 上海青帮[M]. 周育民等,译. 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30.
- [32] 叶高峰,刘德法. 集团犯罪对策研究[M]. 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2.

The Transition of Survival Mode of Modern Secret Socie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ciology

LU Yong

(School of Marxism,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Yancheng Jiangsu 224051, China)

Abstract: The survival mode of the secret society can be systematically examined from such dominant factors as its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form, resource acquisition mode, social communication mode and internal aggregation mechanism. In the process of social change in modern times, these dominant elements have subsequently changed.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has gradually changed from the closed construction to the open structure. The way of acquiring social resources is changing from informal to the joint of informal and formal. The social communication mode changes from single to diversified. Internal aggregation changes from value-oriented mechanism to benefit incentive mechanism.

Keywords: secret society; sect; gangs; social changes; survival mode

(责任编辑:沈建新)